



— 君子文化 —

君子文化丛书·当代君子系列

主编 冰火 胡发贵

哲人君子 任继愈

孙钦香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哲人君子 任維愈

· 卷十 ·

君子文化丛书·当代君子系列

主编 冰火 胡发贵

哲人君子 任继愈

孙钦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人君子：任继愈 / 孙钦香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7. 11

(当代君子小丛书 / 冰火, 胡发贵主编)

ISBN 978-7-5108-6363-9

I. ①哲… II. ①孙… III. ①任继愈(1916-2009)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585号

哲人君子 任继愈

作 者	孙钦香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4
字 数	8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363-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胡发贵

君子为中国文化中饱含人文内涵的人格概念，既具高峻的理想性，又洋溢着人伦日用之间的生活气息，其要义为立德、立言、立功，核心是贡献社会，造福人民。

每个时代都有人民仰慕的人物，特别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风雨如晦之际，沧海横流，英雄挺身；他们为民请命，为国赴难，挽狂澜于既倒，开社会之新面。这些仁人志士，正是可歌可泣的时代君子，他们或为中流砥柱，或为社会良知，或为国家栋梁；远的如明代“前六君子”“后七君子”，近的如“民国七君子”等，均是其间的典范人物。

我们的时代也有许多令人感动的英雄人物，他们满腔家国情怀，一心有利于人民，矢志造福社会，推动民族发展进步，建立了不朽的丰碑。本丛书选了五位有代表性的人物：钱学森，任继愈，曹德旺，朱彦夫，吴仁宝；他们的职业、身份和从事的领域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知名度也有显著的差异，有的盛名满天下，有的则鲜为人知，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心系国家、人民，在各自的领域，均做出了创造性的、杰出的、令人感动的贡献和业绩，他们有功于社会，有利于人民，诚为时代楷模；而他

们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曲折而复杂的奋斗历程，矢志不渝的向上向善的求索精神，既是生动而真实的人生励志教科书，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活力，展现了党领导的正确，充满了“新时代”的正能量，激励人们奋勇拼搏，爱国爱党，爱拼必能赢，奉献必有成。

当然，君子不是圣人，而是优秀的平常人；人人都有君子的潜质，充分呈现、发挥出来的就是君子；君子不是完人，君子是我们身边的好人，他有缺点，孔子说，君子之过如日月经天，但瑕不掩瑜，君子定然有着卓越的令人心向往之的美德。本丛书所讲述的这五位当代君子，无不如此。他们的立德、立功、立言，世有定论，有关他们的论著文字，也可谓汗牛充栋。不过，本丛书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各以其生平事迹为核心，叙其情怀，述其心志，彰显其人格魅力，突出其“可度、可仪、可象”的仰止意义，展示“君子自强不息”这一亘古常新的哲理。让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都能从本丛书的阅读中，感受到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人的激励与冲动，正是我们编纂本丛书的初心。

目录

引子	/ 001
一 和而不流	/ 008
二 “凤毛麟角”	/ 028
三 “文革高烧”论	/ 036
四 师友切磋	/ 046
五 芸竹之缘	/ 061
六 兄友弟恭	/ 066
七 文化传灯	/ 074
八 当代“柱下史”	/ 082
九 育人惜才	/ 091
十 家国情深	/ 101
结语 “老子出关”	/ 118
参考文献	/ 122

引子

他典雅冲淡，谦虚有节，素朴仁厚，严谨理智；

他和而不流，追求真理，一生坚持独立思考，只说自己弄明白的话；

他是坚定而真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灯者，是当代“柱下史”；

他就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

先生出生在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的一户大家庭，四代同堂，父亲任箫亭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是家族中第一位行伍之士；母亲宋国芳亦出自平原县一户乡绅家族。

先生在家排名第二，因大哥任继圣过继给叔父，实则为家中长子，自小便与两位弟弟感情深厚，主动关心两位弟弟的成长。

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文科研究所，坚持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领域中优秀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重大的学术活动组织者；三弟任继亮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曾出版《管仲经济学》一书；四弟任继周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后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兄弟均为饱学之士，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先生娶妻冯钟芸女士，冯女士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一书香世家，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任先生一生酷爱竹子，曾为自己文集取名

“竹影集”，且老伴的文集名曰“芸叶集”，“芸叶”“竹影”相伴成趣，以寄情思。夫妻二人携手相伴，患难与共，恩爱有加，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取名任远，继承父业，在国外研究印度佛教；儿子取名任重，在北京大学工作。

先生一生幸遇众多良师益友，令他念念不忘，自己更是关爱、教育和提携后进，注重人才的培养，关心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对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多有建言。

先生幼时因父亲从军驻防地点不一，读书换过许多地方，9岁那年才正式进入山东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更名为大明湖小学）读书。但1928年济南“五卅”惨案爆发，先生无法在济南继续读书，只好回平原县初级中学念书。1931年，先生考取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开始在北平读书生活。

1934年，先生18岁，如愿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但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偌大北京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先生追随学校一路南下。21岁，先生参加了近代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湘滇黔旅行团”，这次“小长征”对任先生学问和人品的养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8年，先生在新成立不久的西南联合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同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1941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在昆明西南联大8年期间，任先生与冯女士相识相知，在抗日胜利后携手步入婚姻殿堂。1946年5月，双双回到北京大学工作。

但随着内战再次爆发，先生一直处于苦闷心情中不得解脱。1948年12月，先生与众多的老师们选择留在北平，共同迎接北平解放。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再加上清华文科的加盟，当时的北大可谓是人才济济。先生畅游其间，“泡”在北大图书馆热烈地拥抱新知。

1956年，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3月起，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宣誓入党，先生也在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从这一年起，先生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宗教研究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主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指导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他说：“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

20世纪50年代，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哲学，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称赞任先生的研究属“凤毛麟角”。

1964年，先生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秉持宗教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作为一名真诚的学者，“十年浩劫”期间，先生饱受其害，不能专心学术，尤其在“干校”期间，因劳累过度，环境恶劣，致使双眼视网膜脱落，手术也不成功，致使左眼只剩下一点点微弱的光感，右眼几乎失明。

但先生始终未从个人恩怨得失来抨击“文革”，而是从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高度，分析和反思“文革”产生的机制，指出“文革”就像人要发高烧，是不可避免的，早发可以早治愈。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终告结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思想解放，学术研究重新受到重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工作也逐渐恢复了正常。为弥补“文革”期间失去的时光，先生加倍投入到科研与教学任务中去。

但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曾经遭到批判压制的神鬼等封建迷信思想又卷土重来，面对这种思想混乱情况，先生倡议成立中国无神论学会。1978年，学会在南京成立，先生出任理事长。

先生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有神论，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先生始终认为研究宗教的，不能信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宗教，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

他认为，宗教常常是用虚幻的许愿来吸引人，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是具有安慰的作用，是第二位的，不是唯一的。依四弟任继周的说法，“崇尚马克思主义是任继愈先生内心深处的倾向”。任先生坚持认为，“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

1987年，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调任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馆长，这年他正好71岁，古稀之

年，接管重任。

在馆长任上，先生不仅积极推动国家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和硬件设施的改善，而且非常重视传统文献的收藏、保护和整理工作，尽心尽力地编纂多部丛书，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

2005年，先生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这时他已是89岁高龄老人。

退休之后，先生仍每天早晨4点起床，中午不睡午觉，坐着打个盹儿即可，伏案工作到晚上8点止，他曾说：“不读书觉得一天过不去的样子，总要看点书，要不然就没着没落的。”

先生还曾先后被聘为国际儒联的首席顾问、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先生晚年，也颇重视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国文、国学基本知识以及传统道德教育的推广，在他看来，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接触本国的经典，因此先生主张四书应进课堂，还专门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向中小学生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面貌。

先生多年以来坚守三个规矩，即“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以免“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时间”。晚年罹患癌症数载，但他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

2009年3月，先生再次入院，住院期间，仍关心《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工作。6月，病情进一步加重，后陷入昏迷状态。7月11日，先生与世长辞。

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南区的学术报告厅设立任继愈先生灵堂，灵堂中央挂着写有“沉痛悼念任继愈先生”的黑色挽联，遗照两边是一副白纸黑字的挽联，上书“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槃，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这是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詹福瑞先生所题，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先生一生为民族文化和振兴所做的不朽贡献。

先生一生，不畏疾病，不畏逆境，不惧压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国文化做出了一份贡献。各种磨练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强，思维更加敏捷、锐利，看问题更加深刻，也更有远见。

先生一生勤于学问，勇猛精进，从不攀龙附凤，也不趋炎附势。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中，先生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真诚地、认真地思考着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家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执着地追求真理，堪称当代哲人、智慧君子。

一 和而不流

任先生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受过良好的中华经典阅读、古文写作等传统学术训练，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师从汤用彤、熊十力等老先生，是传统儒家学说的信仰者。

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任先生的信仰逐渐发生转变，从一名儒家信徒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无论时势、处境如何改变，他坚定地主张马克思主义要活学活用，反对“影射史学”，而且对自己曾经的认知错误，勇于承认和修正。

先生一生始终坚定追求真理，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坚持只说自己想明白的话，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曲学阿世，扎扎实实做学问，坚持一名学者的尊严和良知。

由儒者转为马克思主义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梳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问题，这一转变过程体现在他对老师熊十力先生自始至终的坦承与恭敬之中。

先生和熊先生相处多年，相知很深。他一生最不能忘怀的老师便是熊先生，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

尽管后来两人的学术立场和观点不同，但熊先生这种“浩荡

为学，高尚做人”的精神品格，一直深深影响着先生。

熊先生在北平的寓所里挂了一副自书的对联，上书“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振兴中华文化的理想。“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是“第一因”。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深挚的爱”，熊先生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先生强调指出：“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

解放后，熊先生虽然申明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但表示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不能接受马列主义，不能相信唯物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

而先生经历新旧中国的巨变，两相对比，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却越来越认同。

先生逐渐认识到，学习中国哲学应当抛弃过去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史料。

他真挚地觉得：“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

1956年，先生主动写信给自己的老师熊先生，坦承“我已